

李修松 著

先秦史探研

XIAN QIN SHI TAN YAN



安徽大学出版社



先
秦
史
探
研

李修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史探研/李修松著. -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81052-986-2

I . 先… II . 李… III . 中国—古代史—研究—先
秦时代 IV . 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323 号

先秦史探研

李修松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照 排	合肥述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行部 0551-5107784	开 本	850×1168 1/32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印 张	16.25
网 址	ahupress.com.cn	字 数	350 千
责任编辑	朱寒冬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986-2/K·84

定价 2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李修松 男,汉族。1958年2月生,安徽含山人。1985年于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为省高校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省首批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998年任校图书馆馆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起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安徽省副主委,现为中央委员。2000年起任省文化厅副厅长兼文物局长,仍在安徽大学指导研究生。现为全国楚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及省钱币学会等副会长、省历史学会学术顾问、省博物馆学会名誉会长等。在国内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文章多篇,出版《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中国社团史》、《中国禅宗二祖——慧可大师传》等著作15部,先后荣获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二等奖及著作一等奖(第二作者)等。

前　　言

我于1978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考入该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师从胡濬咸先生主攻先秦史。从此时算起，我学习、研究先秦史已20多年。虽然其间的研究成果涉及古籍整理、教育史、社团史、古代官场的贪污、传统为官之道与从政艺术、两汉史、佛教高僧传记，以及文博理论、文化（物）旅游等方面，但用功最深的还是先秦史，先秦史研究成果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我研究先秦史，是从这个时期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性质入手的，逐步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徐淮夷及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等。现在看来，正因为从一开始就努力把握先秦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社会性质，从而抓住了这个时期历史的本质，由此拓展开去，从而使自己的研究逐步形成体系。这样的路子，大体上没走弯路。

这本书汇集的是我近年来先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夏商周经济史研究》，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三代经济史研究专著，成稿于1998年，原是一部大型图书的组成部分。由于参加此套图书的编纂者步调不一，至今仍有人未能交稿，以致出版遥遥无期。已有一些参编者陆续将

其所撰写的部分整理出书。因此,这次我也将自己的这部分加以整理,并补充了部分史料(主要是新发现的考古发掘材料),作为我这部著作的三编之一。

第一编共由六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系统论述夏商周(西周)三代时期的自然环境。夏商处于仰韶温暖期后期,气候较为温暖湿润;西周时气候虽然较冷,但仍较如今湿润。黄河流域河湖众多,特别是黄河下游“北播为九河”,低下潮湿,自北而南密集杂陈三大湖沼带,往往浩瀚汪洋,漫漶无际。淮河以南,更是水乡泽国。当时的山丘满盖丛林;平原之上草莱如茵,伴有大片大片的林莽;水流薮泽之畔,水生植物遍布。成群的鸟兽出没,夏商时期甚至常见大象、犀牛等喜暖动物。人们聚居于水泽岸畔的平原台地,渐次开发周围疏松肥沃的土地。南方土壤泥淖,原始的稻作农业缓慢发展。

第二部分着重阐述这个时期的劳动组合和生产关系。三代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在商代表现为族邦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在周代表现为王室、公室、卿大夫(即主干宗族、分支宗族、次分支宗族)对土地的实际所有,作为族长的天子、诸侯(各级贵族)为这种权力的代表和利益的主要享有者。各级宗族土地又被划分为族长(王室、公室之类)直接经营或通过臣下经营的“公田”(收入归族长所有)和由各家族(宗族的基本细胞,也是基本的财产单位和劳动组合单位)经营(收入归各家族所有)的“私田”,反映了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内部结构。族长役使各家族组织人众在公田上进行无偿的集体劳动(“助”或“籍”法),温情脉脉的宗族血缘关系面纱下掩盖了赤裸裸的阶级剥削关系。这个时期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应是原始社会的土地公

有制向春秋以后的土地私有制转变的中间过渡阶段。

第三部分分析三代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君主对国土享有领有权。王室、诸侯封授给臣下的土地可分为封地、采邑和赏田，一般是世袭领有的。封授人口的主体是依附于土地上聚族而居的农人，其次为保有宗族关系的手工业者。奴隶主要来自战俘，一般被赏给各级贵族为家庭奴隶，或罚作牧奴和手工业奴隶。国家对贵族土地进行必要的管理。同时设有多种农官掌山林川泽，以便有效地保护环境、合理利用其资源，及时贡献物产给统治者。“工商食官”，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官府和贵族的需求。市场管理已较为有序，工商税收制度业已形成。

第四部分阐明三代的贡赋和徭役。“贡”指下级贵族向上级贵族贡纳的方物、特产、珍奇及“进人”（包括方国向王朝的进贡）。“赋”指军赋，即下级贵族按周礼应上级贵族的征集而出的军队及相应的车马军实；春秋以后，才随着等级制的破坏和家族的瓦解而渐次转为按家庭征收实物军赋。“徭役”主要包括开道路、桥梁，兴修水利，营筑城邑，修建宫室等，服役的年龄有一定的限制，一般于农闲时进行，但往往有滥征的现象。王室、公室的经济来源主体是“公田”上的收入，其次是工商、畜牧、渔猎等的收入，下级贵族及方国的贡纳也是其基本的经济来源之一。归根结底，这些收入都来自对人民的剥削，故王室、公室经济属于剥削经济的性质。

第五部分叙述三代各部门经济，是本编的重心所在。虽然此时的生产工具仍以木石为主，但由于黄河流域土壤、气候等优越的农耕条件及其他相关的原因，其农业生产力的水平

确已达到了促使社会跨入早期文明要求的水平。北方以黍稷等旱粮作物为主,南方以水稻生产为主(在北方地区也有部分播种),粮食产量有较大的提高。农田沿丘岗台地分布,规划整齐,形成沟洫道路。休耕轮作、粪种选种、壅土培根、除灭虫害、堆肥绿肥及收获、储粮等技术的进步,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畜牧业生产也较为发达,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发展较快。青铜技术精湛,器形繁多,造型和纹饰体现了高超的艺术价值,铭文殊为珍贵。精美的白陶、釉陶和原始瓷器代表了制陶业的最高水平,丝织、麻葛纺织及皮毛加工业也都获得较大的发展,漆器工艺在造型、髹漆、纹饰、镶嵌等方面都令人赞赏,玉石、制骨亦为重要行业,宏伟壮丽的宫殿体现了建筑业的成就,砖与瓦在周代已开始使用。

商代商业受到统治者的重现,周代已形成王朝商贾、诸侯商贾、贵族商贾、方国商贾乃至零散的贩夫贩妇的商业格局,官营商业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很低。带有初期货币特征的多样化一般等价物逐渐定位于贝与铜,度量衡制度也得到一再改进。城市大为发展,都城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宗教文化中心的功能已经具备;以“王道”或“周道”为中轴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业已形成,舟车四达,驿传制度亦成雏形。

第六部分按七大区域阐明三代不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中原地区融合了周边的文明因子,又以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的青铜文化辐射并影响周围地区。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尽管快慢参差,经济生活或以农业为主,或以畜牧为主,

或以渔猎、采集为主,或半农半牧,但都程度不同地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都或先或后进入文明社会,或向文明社会迈进。

第二编《先秦时期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所收入的各篇内容,都曾先后发表。其内容包括对该流域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古国族徐淮夷及其他古国族的研究,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交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构成一部较为系统的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史。其中,该编之九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该流域春秋之前的古国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包括属于徐淮夷的各个古国。该编之十、十一、十二,就徐淮夷的起源,原始居地,在三代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迁徙留居的过程,特别是其作为山岳崇拜的涂山崇拜在他们迁徙留居过程中的孑遗,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证。其中发表于《历史研究》1996年4期的《徐夷迁徙考》一文,曾荣获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该编之三,就大禹治水及其在安徽的传说进行了必要考证,说明安徽淮河流域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该编之二就先秦时期淮河流域交通商业之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该编之四、五、六、七、八就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等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该编之一《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在就上述内容进行必要提炼的基础上,论述了淮河流域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因此,在此不再就各篇的内容一一作概要介绍。

第三编《原始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是我到安徽省文化厅工作后陆续发表的部分研究成果。其中,《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版的文化内涵》一文,是我2001年赴台湾参加在台

湾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古玉学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这次会议,仅大陆赴台参会的学者便有 76 人,确实是两岸共同研讨中华玉学的一次盛会。会上,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器研究成为其讨论的热点之一。这篇论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之后,又发表于《安徽大学学报》2001 年 6 期。文章从凌家滩遗址所反映的社会分工、贫富分化、氏族权贵、专业巫师和礼仪源流等视角,分析了凌家滩遗址的文化性质。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认为:玉龙即虬龙,是后来夏部族虬龙(即句龙、即禹)崇拜的源头之一。玉鹰即鸷鸟,是大汶口文化的创造者少昊氏部落集团首领少昊挚(鸷)的神形。玉版综合反映了当时人们“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及相关内容,反映了中华文化源头——象、数、理的起源,是当时人们测算春分之类四时八节的器物。玉龟系相关的龟卜文化及“玉龟衔符”等的反映。再加上对祭坛(包括太湖山处于祭坛之玄玄大位)等综合分析,还反映了那时凌家滩人山岳崇拜的文化内涵。

《论我国东南地区上古时期的太阳崇拜》一文,是我用力颇深的一篇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 年 2 期,2003 年荣获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一等奖。文章依据考古、文献资料分析认为:河姆渡文化中的“双鸟负日”图案是当时河姆渡氏族集团的复合图腾。发展到良渚文化,“双鸟负日”的“日”已被神化为阳鸟——太阳神,与祖先神相统一,良渚文化中的神徽就是双鸟共负太阳神的复合图腾,也是“三皇”之“皇”的初文。大汶口文化即少昊氏文化,其太阳崇拜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大汶口文化的族徽“鸟”就是“飞鸟负日”的复合图腾;少昊氏的“昊”之繁体“皞”从日从皋,皋为王鸠之

类的鸷鸟,正好与“”的含义相同,说明少昊就是太阳神,其神形就是黑色的鹰,凌家滩玉鹰正是少昊之神形。原始天文历法及原始八卦都产生于太阳崇拜。

《中华龙源流考》一文是我2001年在台湾期间,应《国父纪念馆馆刊》总编辑曾一士先生之约而写的论文,是在原已发表的三篇论文基础上糅合为一的,于当年发表于这个杂志的第8期。本文根据考古、文献、古文字资料,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分析认为:龙的原型为鳄,上古时期曾有氏族豢龙、御龙,用鼍(鳄)皮制作鼍鼓,驯鳄以为渡水工具。夏部族之图腾为龙,禹之神形即为“龙子有角”之“句龙”(勾龙或虬龙)。龙崇拜来源于大河流域农业部落经常性的治水斗争中崇拜内陆水域之王——鳄的活动。在北部和西部边远地区,龙崇拜带有地方特征,已发现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猪龙,西部地区崇拜人面蛇身龙和螭龙。而在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所崇拜的龙原型为鳄(其变异为勾龙或虬龙),后世演变为鳞甲爪牙具备的常见龙形。

以上三篇论文之间的一些内容可以互证,为我们下一步研究龙凤崇拜之起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徽新石器时代三大考古新发现》一文,是应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之邀而作的报告内容,发表于该学会会刊《华夏纵横》2002年1期。本文阐述了安徽地区的薛家岗遗址及薛家岗文化、凌家滩遗址与蒙城尉迟寺遗址三大考古新发现及其文化内涵。这次收入本书过程中,又补充了新发现的资料。特别是就尉迟寺遗址新发现的神器进行了考证,说明该神器座上的动物造型为虎头鸟身,是西来的黄帝部落群中的虎

图腾部落和东方部落群中的鸟图腾部落融合后形成的复合图腾,是《山海经》等文献所记载的“帝俊使四鸟”中南迁的朱虎部落所崇拜的神器。如果这一考证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尉迟寺遗址便是文献所记载的传说中的史前部落居地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得以发现。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薛贞芳女士参与了资料整理。由于我如今忙于行政工作,故这次成书过程中没有时间对上述各编内容精心审改,新材料也不能得到更多的补充,一些最新学术成果难以采用,所以本书出版后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恳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李修松

2005年10月24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夏商周经济史研究 /1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 /1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气候 /4

(二)三代时期的河流与湖泊状况 /6

(三)三代时期的森林、草场及动植物资源 /11

(四)三代土壤状况及其开发利用 /25

二、三代的人口、劳动组合及生产关系的性质 /28

(一)三代人口简析 /29

(二)以木石工具为主的生产力性质 /34

(三)以家族为单位的劳动组合 /38

(四)三代的宗族土地所有制 /44

(五)“助”法及族长役使制 /53

三、三代的经济管理体制 /58

(一)君主对国土的领有权 /59

(二)王室、诸侯对土地、人口的封授 /63

- (三)国家对贵族土地的管理 /68
- (四)农官对农业生产的管理 /71
- (五)山林川泽的管理及其利用 /75
- (六)工商食官 /79
- (七)关市的管理及关市之征 /84

四、三代的贡赋及徭役 /88

- (一)从“任土作贡”到周代的贡纳制度 /89
- (二)军赋的征集 /94
- (三)三代的徭役 /98
- (四)王室、公室的经济来源及其性质 /101

五、三代各部门经济 /105

-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107
- (二)手工业的成就 /131
- (三)商业与交通 /148

六、三代各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区域经济 /169

- (一)作为文明中心的中部农业区 /171
- (二)古老的东夷文明区 /173
- (三)长江中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开发 /178
- (四)东南沿海地区的越族经济 /181
- (五)巴蜀地区的农业文明 /184
- (六)以羌族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经济 /187
- (七)北方游牧经济和半农半牧经济 /191

第二编 先秦时期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 /195

一、先秦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位 /196

二、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交通开发	/210
三、大禹治水及其在安徽的传说	/257
四、商代淮河流域经济述论	/265
附：从《夏小正》看夏、商、周时期淮河流域经济	/276
五、西周时期淮河流域经济述论	/281
六、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手工业述论	/292
七、战国时期淮河流域手工业述论	/301
八、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流域农业述论	/311
九、淮河流域古国族考述	/324
十、淮夷探论	/364
十一、徐夷迁徙考	/387
十二、涂山汇考	/405
第三编 原始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426
一、中华龙源流考	/426
二、论我国东南地区上古时期的太阳崇拜	/444
三、安徽新石器时代三大考古新发现	/478
附：尉迟寺出土虎头鸟身神器小考	/486
四、试论凌家滩玉龙、玉鹰、玉龟版的文化内涵	/490

第一编 夏商周经济史研究

夏商周(西周)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即学术界统称的“三代时期”,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第一个历史时段,也是中华文明形成后的早期发展阶段。黄河流域以其在土壤、气候等方面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等原因,从而使其生产力加速发展,同时适时吸引了周边地区原始文明的因子,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率先跨入文明。并且随之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各部门经济也获得了相应发展。三代时期的“文明”,大致以王朝直接控制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逐步向四方间接控制的地区,以及其影响的地区辐射;三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也是以中原地区最高,并由近及远影响四方广大的地区;再加上各地区当时不同的自然条件的影响,从而导致各地区不平衡的并且带有自身特色的区域经济。

一、夏、商、西周时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

人 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摄取自然资源,经受自然考验,在学会顺应自然的同时与自然作斗争,不断地战胜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创造自己的历史。与此相一致,一定的自然环境必然

影响人类的活动,从而影响人类的历史。优越的自然生存条件会养成人们的惰性,从而导致那个地区历史发展的滞缓;变差的自然生存条件会促使人们激发潜能和创造精神,提高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战胜自然,从而导致那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加速。所以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应战所产生的结果,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于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①。

在长达数千年的仰韶温暖期^②内约距今5000年的数百年间,黄淮海平原曾有一次气候波动,形成一次低温事件^③。这与该时期欧洲冰川扩张、气候转冷是一致的。根据孢粉组合分析,当时南京一带的气温要比现在低1℃~2℃^④。这种气候造成喜暖动物一度南移和喜暖植物一度向南萎缩,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动植物资源减少了。而且,此后的气候回暖带来雨水暴降,以致尧、舜、禹时期“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自然环境的恶变,促使人们奋起抗争,治服洪水,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从而走出野蛮,迈入文明。

夏商属仰韶温暖期后期,气候已恢复平稳,较现在温暖湿润。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比如今要高2℃,甚至更多,如一月温度比现在高3℃~5℃。自然带与今天相比,也要北移2~4个纬度。故此,黄河中下游属于亚热带或它的临近气候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② 即全新世温暖期,是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气候回暖所致的最温暖时期,国外通常称大西洋期。在我国,因此期与仰韶文化有某些联系,故名。

③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一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④ 徐馨等:《南京东门镇西全新世孢粉组合及古气候与古环境的探讨》,1982。